

人类学的学科整合和分头并进

——以“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”为例

杨志刚

(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, 上海 200433)

摘要

文化人类学曾被一些学者称誉为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“科际整合”的特点。然而即便如此, 它的未来发展, 仍面临着如何在当下的格局中进一步规划学科交叉, 以求创新和突破的挑战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以降, 文化人类学酝酿出许多新的走向, 如趋于应用性, 理论的多元化, 研究领域的条块分割和课题的不断精细。这自然也开出了一些新气象, 但这门学科所处的尴尬和窘境也在日益暴露。而最大的危机, 则来自它建构新的知识体系、深度阐释社会文化现象的创新和综合能力的日渐丧失。如何寻求突破, 看来破除“体质”与“文化”间长久以来形成的壁垒; 在“文化”的领域, 进一步打通文化人类学(民族学)、考古学、语言学之间的界域, 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交叉性的研究, 互相激活, 是至关重要的。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其倡导学科整合的主张, 其最大的意义亦在于此。

“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”(教育部立项)实施之初, 我们就有意于这方面的探索。确切地说, 这个项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尝试多学科交叉的机会。此话的预设前提是: 囿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思路, 无法建设好这个“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”;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“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”, 必须强调学科的交叉和整合, 以此增强它的科学内涵和优良品性。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和罗列, 而是有深度研究为其依托基础的。

已有研究生借助加速器 PIXE, 对藏品中的高山族腰刀刀柄上的金属钮进行成份测试, 并结合台湾的矿产资源, 推测制造腰刀的金属原料的来源。更深入的研究正在规划中。如有研究生提出: 应“立足于博物馆所藏的几大类民族民俗文物, 从对每一类文物的具象研究(形态、纹饰、功能及其涵义)上升到其所代表的人类群体的系统研究, 从藏品特征含义的相互关系来透视所代表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”。

自然, 在强调科际整合的同时, 各研究方向的分头并进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推进的。因此反映到“复旦大学文化人类学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”上, 我们也注意汇集各方面的力量, 从不同的角度, 把课题做深做透。